

社会实践网络与再情景化的纵横维度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课题及解决方案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区别性特征。但是, 尽管批评话语分析学者注意到社会实践网络中各个社会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以往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社会实践往往是单一的社会实践, 并未将社会实践置于社会实践网络中进行研究。本文将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实践的分析研究扩展到社会实践网络, 考察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文章将社会实践网络中的社会实践与其所处的不同社会领域结合起来考察, 从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考察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提出“纵向再情景化”和“横向再情景化”的概念, 以此分析研究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间的相互作用。文章在认识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同时, 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解读, 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以推动批评话语分析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社会实践网络; 纵向再情景化; 横向再情景化; 批评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7)06-0007-05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analyzing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However, most of researches in CDA often focus on one single social practice though some CDA practitioners have noticed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practices in the network of social practic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by taking the network of social practices as its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es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practices as they work in the network. For this purpose, the article relates the social practices to the fields in which they work and, by 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vertical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horizontal recontextualization”, investigate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play of social practices. In doing so, the author proposes a solution to the new issue of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that CDA has to face in its development, hoping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twork of social practices; vertical recontextualization; horizontal recontextualizati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7.06.002

1. 社会实践: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话语”。但是, 批评话语分析所研究的“话语”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 如不是哈里斯(Harris 1952)所说的“话语”(discourse), 而是福柯(Foucault 1984)意义上的“话语”(discourse), 是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话语”(辛斌 2016)。这里的“话语”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用的语言, 但更重要的是与语言运用相关联的社会因素, 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和制约人们运用这些语言方式的社会规约(田海龙 2009)。

因此, 批评话语分析以“话语”作为研究对象, 就不能仅仅对体现语言运用的文本或口语等形式进行语言学分析, 如不能仅对政治家的演讲稿(speeches)或新闻媒体的新闻稿(newspaper articles)进行语言结构和特征方面的分析研究, 尽管这可以构成批评话语分析的部分内容(田海龙 2016a)。相反, 批评话语分析以“话语”作为研究对象, 意味着批评话语分析要对这些政治家的“演讲活动”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活动”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社会活动是“或多或少

相对稳定的社会活动形式”(Fairclough 2012: 187), 是“受到社会规范的做事的方式”(van Leeuwen 2008: 6)。在这个意义上,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实践”, 或者说, 话语即社会实践(Fairclough & Wodak 1997)。

可见, 更专业地讲,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实践”。批评话语分析即是对“社会实践”的分析。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 对“社会实践”的分析通过对话语与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研究来进行, 即通过对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一“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来进行(Fairclough 1992)。他认为, 在一个社会实践中, 除了话语以外, 还有其他成分(elements), 包括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身份、文化价值及意识(Fairclough 2012: 187-189)。这些成分相互作用, 使得社会实践以某个具体的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y)的形式发生, 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则要通过运用语言在这些活动中获得利益或实现目的。在费尔克劳看来, “话语实践”是一个为了方便分析“话语作为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成分”而提出的术语, 可以在方法论层面更清晰地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分析(田海龙 2017)。在

理论层面,“话语实践”的概念可以更加强调“话语”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

这样,我们可以说,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也是“社会实践”,更要集中在“话语实践”上面。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批评话语分析将研究的视野从语言本体(甚至语言运用本身)扩展到语言运用及与语言运用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与语言运用不可分离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他们的社会身份、价值取向、机构属性等等。其研究分析的对象不再是任何一种语言运用的文本形式,而是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话语与其他成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不是双方各占50%的平均分配,而是在强调话语受到其他成分制约的同时更强调话语对其他成分具有建构作用。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更加关注话语对社会事实、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再现作用,即话语的“社会功能性”(田海龙 2012),强调话语“对社会现状的保持和再创造作用,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改变作用”(Fairclough & Wodak 1997)。这意味着,话语作用的发挥要通过话语实践,以各种各样再现社会事实和人物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出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话语实践无疑也发挥着意识形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社会实践一般是单一的社会实践,如政治家的演讲。这样的社会实践发生在一个相关的领域(field),如政治家的演讲发生在政治领域。这方面批评话语分析的实例有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12)运用“辩证关系”方法对英国工党发布“社会福利绿皮书”的社会实践进行研究,以及沃达克和她的团队(如Reisigl & Wodak 2009)运用“话语历史”方法对奥地利自由党发布“奥地利优先”请愿书社会实践的研究。这些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社会实践中的话语(体现为文本形式)进行分析来研究社会实践,考察话语与其他成分的联系,考察话语与权力关系,剖析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但是,总体来说,其考察的社会实践集中在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如政治领域),因而也是相对孤立的单一的社会实践。

2. 社会实践网络:批评话语分析面对的新课题

将话语作为单一的社会实践进行研究,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有着浓厚的基础。然而,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实践并非单一、独立存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实践也并非没有联系,正如啜莉雅姬和费尔克劳(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37)指出的那样,社会实践是发生在社会“实践的网络之中”或者说,一个社会实践与另一个(或其他)社会实践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一个领域(如政治领域)里的不同社会实践,以及不同领域(如政治、教育和商业领域)里的各种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彼此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网络。对此,虽然批评话语分析的开拓者有所认识^①,但是,将社会实践网络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实践中仍是一片未

被开垦的处女地。21世纪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视野需要拓展,研究方法需要更新”(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社会实践网络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社会实践网络纵横交错,由不同社会实践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构成。从横向维度来看,社会实践网络是不同领域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在一级政府机构将拟出台的政策和法规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征求民众的建议和意见的时候,往往实施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但是,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也和其他社会实践相互作用,在社会实践网络中与其他社会实践彼此关联。田海龙(2014: 199-214)对一个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进行研究,发现这个社会实践和新闻传播领域的新闻报道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政府在实施“征求意见”这一社会实践的时候,新闻机构并不只是公布政府需要征求意见的内容,而是通过电视、报纸以及网络进行报道和评论。新闻机构所实施的“新闻报道”的社会实践客观上起到了对政府征求意见社会实践的支持,造成了政府在邀请公众提出意见的形式下推销其方案的事实。这样,来自两个不同领域(行政管理领域和新闻报道领域)的两个社会实践相互作用,彼此呼应,使征求意见这个本应以双向交流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变成了政府对其提出的征求意见的内容单方面的宣传和推销,最终使“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成为一个杂糅的、实现多种目的的社会实践。

从纵向维度来看,这个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与上级部门实施的行政管理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注重民生、注重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制定法规的过程中体察民情民意并吸收民众的建设性意见是基层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曾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从2014年起,各级政府及部门凡出台重要政策和制定涉及群众利益的工作措施,必须在本级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②上级政府部门实施行政管理的社会实践,下级政府机构则按照要求实施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这种纵向的社会实践网络关系促成了这两个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行政管理的社会实践和征求意见的社会实践在一个社会实践网络中处于纵向的等级维度上,属于上位社会实践和下位社会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横向的社会实践网络关系不同,没有形成一个杂糅的社会实践,而是表现为上位社会实践对下位社会实践的支配和规范(regulating)。

社会实践网络中发生在横向和纵向维度的社会实践,其相互作用可以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如上所示,纵向维度上的社会实践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横向维度的社会实践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和新闻报道领域。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实践的网络,不论是发生在相同领域还是不同领域,各种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主要是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话语生产、传播、消费之间”(Fairclough 1992)的相互作用。

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关注,体现在社会实践网络上面,则是对某个社会实践的话语与另一个(或其他)社会实践的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来研究“社会实践的网络以及网络中的社会实践构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等问题(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37)。如此,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话语(或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

那么,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间是如何通过话语或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什么特征?下面我们通过考察发生在1995—1996年的“严打”斗争时期的一个案件来寻找答案。

3. 纵向维度的社会实践网络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公检法系统进行了一场对所有犯罪行为的“严打”斗争。这场斗争始于公检法高层领导的一系列讲话。例如,1995年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在对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强调要开展一场对犯罪分子的“严打”斗争。同年12月19日,在全国政法系统工作会议上,任建新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又一次强调“严打”的必要性,并提出8条要求,其中包括:

始终把维护稳定放在政法工作的首位,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严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坚持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动员全社会力量,运用多种手段,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③

在这个讲话中,“从重”、“从快”、“从严”的原则被定为“严打”的基调。作为中国政法界最高领导,中央政法委书记提出的这些“严打”的原则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因此,这些原则很快在检察和公安系统得到贯彻。1996年4月18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在北京视察工作时号召全国各级检察院加快办案节奏,配合法院重判一批,杀一批^④。1996年4月12日,公安部召开“严打”工作会议,任建新再次发表讲话,强调政法部门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力以赴投入“严打”斗争。指出:

公安机关处在“严打”斗争的最前线,要大力加强侦查破案工作,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攻克特大恶性案件,限期破案;各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要加快办案速度,该批捕起诉的依法抓紧批捕起诉,该重判的依法尽快重判,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依法判处极刑^⑤。

199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以“贯彻落实党中央维护社会治安指示精神‘严打’斗争在全国展开”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这场“严打”斗争定义为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针对部分地方治安状况不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党中央最近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开展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以进一步维护社会治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⑥。

在这些领导的讲话和权威媒体的报道中,“从快”、“从重”、“从严”的原则被不断强调,其权威性不断加强,“严打”话语由此生产出来,并被传播、被贯彻,成为行动的指导方针。这样一个“话语实践”构成了以“严打”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实践的核心内容。当这样的“元话语实践”被植入到案件审理的社会实践中去的时候,便可产生相应的结果。例如,1996年4月9日,呼格吉勒图在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公厕里发现一具女尸,并主动找到辖区民警报案。之后,他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认为有作案嫌疑并实施拘捕。同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在当日枪决。这个案件在2014年12月被平反,但造成这个冤案的原因与“严打”期间“从重、从快”的原则不无关系。

呼格吉勒图在两个月之内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确实体现了“从快”、“从重”、“从严”的原则,但这还不是判其死刑的“审判社会实践”与“严打社会实践”之间联系的全部内容。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这两个社会实践通过“严打”话语从上到下的“纵向再情景化”造成了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不仅是一个可见的从上到下的“再情景化”,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等级性质的、实施权力和影响的“再情景化”。

这个纵向再情景化的等级性质来源于“审判社会实践”的主体(基层法官)对“严打”话语的权威性的认可。根据范代克关于“语境模式”(van Dijk 2012)的论述,基层法官通过学习这些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参加各种贯彻执行会议,认识到一场“严打”的运动已经到来,进而主观建构出对犯罪分子“从快”、“从重”、“从严”惩处是当前的大趋势、大气候。这样,“严打”话语的权威性和对基层法官的规范性,通过基层法官的认可而形成。体现在“严打社会实践”被再情景化到“审判侦查社会实践”的再情景化过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便显现出来。例如,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报》刊发《“四九”女尸案侦破记》为题的报道,称1996年4月9日晚8时接到报案,当日审讯,“进展极不顺利”,市公安局局长10日亲自到分局,作出“特别”指示,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正如这份报道所言,“熬了48小时之后”终于获得有罪供词。这里,那些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的“严打”话语片段被从原始情景中剥离,并通过一定的语言手段在新的“贯彻执行”情景中传播,这样一个再情景化过程,不仅产生了新的情景,同时新的情景也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赵苋、田海龙 2015)。“从快”的话语被生产出来,被传播开来,也被上级接受。这个“从快”话语在新闻报道中产生出来,是“严打社会实践”中“严打”话语被再情景化到“侦查审判社会实践”的结果,体现出“元话语实践”的影响,也体现出纵向再情景化的等级性质。

4. 纵向与横向再情景化: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引用了“纵向再情景化”的概念,这是基于“纵向话语”和“再情景化”两个概念的综合。“纵向话语”(vertical discourse)概念源自伯恩斯坦(Bernstein

2000)对知识类别和传播方式的讨论。在伯恩斯坦看来,“纵向话语”与表明日常生活中普通知识的“横向话语”(horizontal discourse)不同,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特殊知识。“纵向话语”传播的方式也与“横向话语”不同,它不是在不同场景(或语境)之间传播,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因此,“纵向话语”的传播有机构运作的成分,其传播的基本方式是再情景化(Bernstein 2000: 155-174)。从伯恩斯坦关于“纵向话语”的论述,我们可以提炼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相对)的几个含义:1)“纵向”维度的传播具有机构的性质(并非自然传播);2)“纵向”维度的传播具有等级的性质(并非跨界传播);3)“纵向”维度的传播可以产生带有规范功能的抽象的理论(并非知识的杂糅)。伯恩斯坦的“纵向话语”概念帮助我们认识“严打”话语从具有权威的决策机构传播到基层公检法部门并被贯彻到侦查和审判过程时,所体现出的机构性、等级性和规范性。与此相对,从伯恩斯坦(Bernstein 2000)关于“横向话语”的论述,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横向再情景化”的概念。

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概念最初也是伯恩斯坦提出。所谓“再情景化”意即话语从原来的实践和情景中被移出,并依据一定的组序和聚焦的规则被重新建构起来,进而把原本真实的实践改造成了虚拟或想象的实践。伯恩斯坦(Bernstein 1990: 159)认为,再情景化有选择性地“挪用、重建、重新聚焦并关联其他话语,以形成自己的秩序”因此,当某个话语从原来的情景被移动到新的情景,由于受到规约性话语的控制和改造,附着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也随着移动,新产生的话语与原来的话语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些区别一方面表现为新产生的话语具有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新话语包含了意义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范柳文(van Leeuwen 2008)通过观察悉尼一份报纸“家庭版”的文章,发现社会实践中的许多成分通过删除、增加、重复、替代以及重新安排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带给“再情景化”新意义的同时,也将社会实践参与者对一些活动的反应和对社会实践构成成分的评价带了出来,并构建出参与社会实践的目的。可见,再情景化不仅可以带来新话语中新老意义的杂糅,还可以导致新的权力关系,使一个话语殖民于另一个话语。

基于伯恩斯坦的“纵向话语”、“横向话语”以及“再情景化”的概念,我们提出“纵向再情景化”和“横向再情景化”的概念,借此来考察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以往批评话语分析对单一社会实践的研究中,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12)将话语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即“话语被内在于其他成分之中”。与此不同,我们从再情景化的“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观察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可以探索相同或不同领域中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回应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关切。

在社会实践网络中,各个社会实践发生在社会生活中

的不同领域(如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也可以发生在一个领域里不同的等级层次(如处于决定地位的上层和具有服从责任的下层)。考察社会实践网络中社会实践在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的再情景化,依据田海龙(2016b)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需要:第一,确定被移动的话语或话语实践;第二,确定该话语或社会实践最初所处的原始情景;第三,确定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即促成该再情景化发生的机构或社会人;第四,确定新的情景;最后,确定被移入新情景中话语或社会实践的新意义。就社会实践网络而言,被移动的话语是某个领域里发生的社会实践,由于批评话语分析在理论上认为“话语即社会实践”,在方法论上认为研究分析“话语即社会实践”重点就是研究分析话语如何被生产、被传播和被接受这样的“话语实践”(田海龙 2017),那么,这个被移动的话语就可以被认为是发生在特定社会领域的“话语实践”。就上文关于纵向维度的社会实践网络而言,这个“话语实践”就是“严打”话语产生、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它最初所处的“原始情景”是决策层的情景,是在决策层的讨论酝酿之后被移入基层“贯彻执行”的“新情景”之中。促成这一“再情景化”发生的始作俑者是处于决策层并具有权威的机构,而这个再情景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则是决策层“话语实践”在“贯彻执行”新情景中的实际作用,从而导致了呼格吉勒图案例这一社会事实的发生。

与“纵向再情景化”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不同,“横向再情景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领域中发生的“话语实践”被移入到另一个领域的过程。徐涛(2004)考察了商业领域的“促销话语实践”被移入到教育领域的“横向再情景化”过程,发现商业领域中以盈利为目的的对产品的宣传和推广,以“促销”话语实践的方式迈出其所属的商业领域,逐步进入教育领域。徐涛(2004)还分析了2000年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招生简章,发现在招生简章中“英语系既要做到让自己的宣传吸引‘消费者’,同时又要尽可能把某些约束条件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在包装产品的同时尽量避开某些强制性因素”。可见,商业领域的促销话语实践在被“再情景化”到教育领域的时候,在招生简章中英语系是一种多重的身份,一方面以管理者的身份向被管理者(学生)传达信息,另一方面,又以“商家”的身份推销自我,劝诱消费者购买其“商品”(也就是教育消费品)。这种多重身份以话语杂糅的形式出现,体现出话语的“跨界”(徐涛 2006),是一个领域的“话语实践”被“横向再情景化”到另一个领域的结果。

考察社会实践网络中各社会实践间的互动关系,发现这些社会实践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或同一社会生活领域,这是“再情景化”纵横维度的一个特征。可以初步认为,“纵向再情景化”发生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同社会实践之间,“横向再情景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实践之间。除此之外,以上的观察还可以导致如下初步结论,即“纵向再情景化”是一个单向的、具有等级特征的再情景化,这个再情景化本身作为社会实践起到

支配和规范的作用,也会导致“被规范”的社会实践,尽管这个社会实践也会再去规范其他社会实践。与此相对,“横向再情景化”是一个“跨界”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的社会实践彼此关系相对平等,因而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双向”的、彼此相互作用的再情景化。但是,这种“双向”和“相互作用”也是相对而言,并不排除一个领域中的社会实践对另一个领域的社会实践实施“殖民”式影响。就再情景化的结果而言,与“纵向再情景化”导致规范性社会实践不同,“横向再情景化”往往会导致社会实践在话语层面的杂糅,即不同领域的话语被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方式。

5. 结语

批评话语分析经过从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简称CL)到批评话语分析(CDA)的转变(田海龙 2009),进入到从批评话语分析(CDA)到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简称CDS)的新阶段(田海龙 2016c)。批评话语分析不断发展的动力源自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各种新问题(田海龙、赵芃 2017),而批评话语分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构成了它发展壮大的轨迹。这也说明,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以解决宏观理论问题为目的,而是以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获得理解性解释为己任的。本文结合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现象和问题,思考批评话语分析面临的社会实践网络这一新课题,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同行学者的批评和帮助,使之不断完善,以推动批评话语分析的深入和发展。

注释:

- ① 例如,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辩证—关系”方法的五步分析框架中,费尔克劳就将确定社会问题所处的实践网络作为第二步的三个分析对象之一(参见 Fairclough 2012: 189)。
- ② 见多彩贵州网 <http://www.gog.cn/zonghe/system/2013/12/20/013008679.shtml>。
- ③ 见 1995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
- ④ 见 1996 年 4 月 19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
- ⑤ 见 1996 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
- ⑥ 见 1996 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报》第 1 版。

参考文献

- [1] Bernstein B.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2] Bernstein, B.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 (Revised Ed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3]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1992.
- [5] Fairclough, N.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A]. In H. Tian & P. Zhao(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1-225.
- [6]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C]. London: Sage, 1997: 258-284.
- [7]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discourse [A]. In M. Shapiro(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108-138.
- [8] Harris, Z. Discourse Analysis [J]. *Language*, 1952(28): 1-30.
- [9] Krzyzanowski, M. & Forchtner, B.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acing challenges, moving beyond foundation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3): 253-261.
- [10] Reigl, M. &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 Meyer(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C]. London: Sage, 2009: 87-121.
- [11] van Dijk, Teun A.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 [A]. In H. Tian &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263-295.
- [12] van Leeuwen, 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3] 田海龙.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14] 田海龙. 话语功能性与当代中国新话语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2(6): 8-11 22.
- [15]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思考、运用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 [16]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a(2): 1-9.
- [17] 田海龙. 跨文化研究的话语解读——再情景化模式 [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b(2): 50-60.
- [18] 田海龙.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c(6): 3-9.
- [19] 田海龙.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 [J]. *外语研究*, 2017(3): 60-64, 71.
- [20] 田海龙, 赵芃. 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研究 [J]. *当代语言学*, 2017(4): 494-506.
- [21] 辛斌. 语言的建构性和话语的异质性 [J]. *现代外语*, 2016(2): 1-10.
- [22] 徐涛. 促销文化对机构语言的“殖民化”影响——中国高校招生简章之个案分析 [J]. *南开语言季刊*, 2004(1): 134-142.
- [23] 徐涛. 机构话语的“跨界” [J]. *外语教学*, 2006(3): 24-32.
- [24] 赵芃, 田海龙. 再情景化新解——元话语视角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4): 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4BYY0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学院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孙毅